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6-0671-06

日译西学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

——以居日期间的梁启超为中心

徐水生

[摘要] 梁启超居住日本期间,充分吸收日本学者译介的西方文化,向国内学人大量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学派、理论、范畴,并提出了融会中西思想的理想人格论——“新民说”,其论著影响了一大批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史料证明,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关键词] 梁启超;中国近代哲学;日译西学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哲学由“经学”形式向近代的转型,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决定的;其次,也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内在必然。但是,毫无疑问它与当时传入的先进外来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史料证明,赴日中国学者(尤其是1898年至1918年期间)回传的日译西学^①为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以1898—1912年居住日本期间的梁启超为中心,从一个侧面来说明上述问题。

一、梁启超居日期间的日译西学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重要思想家、著名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以前,他接受的知识基本限于应付科举考试的训诂词章之学。1890年后,他拜康有为为师,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这种理论虽然吸取了某些近代的知识和观念,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仍没有摆脱经学的形式。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当即逃亡日本,从此,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梁启超在1899年撰写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说:“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1](第80页)

一年后,梁启超又写道:“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2](第186页)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也写道:“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3](第18页)笔者在此大段引用梁启超对赴日最初几年的景况之回忆,试图强调的是:其一,梁启超此时所读的大量书籍是日译(含编译)的西学著作,内容主要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二,这些著作对梁启超的心灵产生了强烈震撼,起到了“思想为之一变”的重要效果。

那么,梁启超深受其影响的明治思想界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日本明治新政府于 1868 年提出了“求知于世界”口号,并随后制定了“文明开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近代的知识和思想在日本的传入。1873 年成立的“明六社”,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合法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在文明开化运动中起了先导作用,在活动期间共出版杂志 43 期,发表论文百余篇,传播了大量的西方启蒙思想,其中包括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英国边沁和穆勒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福泽谕吉(1834—1901)是“明六社”中的重要代表,他曾三次出国,对欧美思想领会颇深,提倡个人自由平等、国家独立、尊重实学,其撰写的《西洋事情》(1847 年)当时销售 20 多万册,《劝学篇》(1872—1876)共销售 70 万册,《文明论概略》(1875)影响巨大。这类介绍西方近代思想,批判封建主义的著作受到了明治时代人民的热烈欢迎,也与当时中国以经学内容为主的哲学思想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同时,西方思想名著也在明治日本被大量翻译出版。如:1870 年英国的斯迈尔斯(1812—1904)著,中村正直译的《西国立志编》(《自助论》)出版。1872 年,穆勒著,中村正直译的《自由之理》出版。法国基佐(1787—1874)著,村田充实译的《西洋开化史》出版。1875 年,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尔(1821—1862)著,大岛贞益译的《英国开化史》(此书日译本甚多,对福泽谕吉等人影响很大)出版。1877 年,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穆勒(1806—1873)著,西周译的《利学》出版。1878 年,英国哲学家、进化论的社会思想家的斯宾塞(1820—1903)著,铃木义宗译的《斯边撒氏代议政体论》出版。1881 年,斯宾塞著,松岛刚译的《社会平权论》(至 1884 年全部译完)出版;英国的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1809—1882)著,神津专三郎译的《人祖论》出版。1882 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著,中江兆民译的《民约译解》(即《社会契约论》)卷一开始出版。1884 年,斯宾塞著,乘竹孝太郎译的《社会学之原理》出版;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著,石川暎作译《富国论》出版。1886 年,法国富耶著,中江兆民译的《理学沿革史》(即《哲学史》)出版。1889 年,德国经济学家 Friedrichlist(1789—1846)著,大岛贞益译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氏经济论》)出版。1894 年,德国法学家 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著,宇都宫五郎译的《权利竞争论》出版。可以说,近代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思想著作,基本上均在明治日本得到出版。有的西文著作甚至有多种译本,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伯克尔的《英国开化史》,穆勒和斯宾塞的著作等。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编著或自著的介绍西方哲学和思想的论著也纷纷出版,如:1874 年,西周的《百一新论》、《致知启蒙》(日本关于形式逻辑最早的解说书之一)出版。1875 年西周的《人生三宝说》,加藤弘之的《国体新论》出版。1879 年,植木枝盛的《民权自由论》的出版。1881 年,井上哲次郎等人编著的《哲学字汇》出版。1886 年,西周的《心理学之一斑》、中江兆民的《理学钩玄》、井上圆了的《哲学一夕话》出版。1895 年,津田真道的《唯物论》、大西祝的《西洋哲学史》,金子马治的《哲学纲要》出版。1896 年,中岛力造的《车免近的伦理学》、大西祝的《社会主义的必要》出版。1900 年,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等出版。1901 年,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中江兆民的《一年有半》、波多野精一的《西洋哲学史要》出版。1903 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论》出版。1904 年,朝永三十郎《哲学辞典》等出版。这类著作作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居日的中国学人提供了广阔的西方文化知识和丰富的思想资料。

二、梁启超的译介与域外先进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需要从多方面展开。其中表现之一是,由封闭性转为开放性,由自说自话到能与其他民族哲学家对话、交流,这就需要将域外的先进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以有助于中国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而梁启超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的传播工作。

他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中,重点介绍了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1561—1626)和法国近代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的思想。梁启超指出:“综论培根(今译培根——引者注)穷理之方法,不外两途,一曰物观,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原,凡对于自然界至寻常至粗浅之事物,无一可以忽略,二曰

心观。当有自主的精神,不可如水母目虾,倚赖前代经典传说之语,先入为主以自蔽,然后能虚心平气,以观察事物,此培根实验派学说之大概也。自此说出,一洗从前空想臆测之旧习,而格致实学,乃以骤兴。”^[4](第4页)

梁启超又介绍说:“笛卡尔起,谓凡学当以怀疑为首,以一扫前者之旧论,然后别出其所见;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实为数千年学界当头棒喝,而放一大光明以待来哲者也……笛卡儿以为断事理者,意识之事也;见事理者,智识之事也。”^[4](第6页)“培根与笛卡儿两派,自其外形论之,实两反对派也。甲倚于物,乙倚于心,甲以知识为外界经验之所得,乙以智识为精神本来之所有,甲以学术由感觉而生,乙以学术由思想而成,两派对峙相争,殆百余年,其间祖述之者,各有巨子,试略举其重要者如下:格物派(英吉利)——培根、霍布士 Hobbes(1588—1675)、陆克 Locke(1632—1704)、谦谟 Hume(1711—1776);穷理派(大陆)——笛卡儿、斯宾诺莎 Spinoza(1632—1677)、黎菩尼士 Leibniz(1646—1716)、倭儿弗 Wolf(1679—1754)。以上诸家各明一义,议论愈剖而愈明精,真理愈辨愈明,至于十八世纪之末,德国大儒康德(Kant 1724—1804)者出,遂和合两派,成一纯全完备之哲学。而近世达尔文 Darwin、斯宾塞 Spencer 诸贤出,庶物原理之学益光大矣。”^[4](第10-11页)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启超通过日译的西学著作,对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近代的经验论学派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唯理论学派有较深入的理解,对18至19世纪的康德哲学、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实证主义均有整体的把握。

1903年,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他在文中说:“吾昔见日本哲学馆有所谓四圣祀典者,吾骇焉。稽其名,则一释迦,二孔子,三梭格拉底,四康德也。”^[4](第47页)“康德者,德人也。德国之哲学为近世欧洲中之最有力者,此普天下所同认也。虽然,以年代论之,则德人之哲学,比诸英法瞠乎在其后……而卒能使德国学者之位置一跃而占十九世纪学术史之第一位者,曰惟康德之故。康德实德国学界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以康德比诸东方古哲,则其言空理也似释迦,言实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贯诸实行以似王阳明。”^[4](第49页)随后,他从“智慧之视听作用”、“智慧之考察作用”、“智慧之推理作用”、“论道学(谓道德之学)为哲学之本”、“论自由与道德法律之关系”等方面详细地介绍了康德的学说。梁启超虽然是叱咤风云的近代政治家,但他毕竟也是位学问渊博的学者,有着自知之明的心态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故在该文的案语中坦率地说:“康德学说条理繁赜,意义幽深,各国硕学译之犹以为难,况浅学如余者。兹篇据日人中江笃介(即中江兆民)所译法国阿勿雷脱之《理学沿革史》为蓝本,复参考英人东人所著书十余种汇译而成。虽用力颇劬,而终觉不能信达。”^[4](第50页)梁启超既在这里说明了其介绍康德学说所主要依据的是日本学人的著作,也坦承了自己学识功力的不足。此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风,令我们身处浮躁学风盛行的当代学人也不得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几分惭愧。

总之,除了以上几篇外,梁启超在1901—1903年中还发表了《霍布士学案》、《卢梭学案》、《斯宾诺莎学案》、《论希腊古代学术》、《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以近代内容为主的西方哲学和思想。尽管由于梁启超个人学养(含外语水平、西学知识)的原因和历史的客观条件所限,他的以上西学译介存在着某些模糊,乃至误读、曲解之处。但是,由于这些文章是在《新民丛报》等面对国内同胞的杂志上发表的,故它为中国思想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史中难得的思想养料。

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史家贺麟先生高度评价了梁启超译介西学的历史贡献:“他在日本期间,从1901—1903年写了不少介绍西学的文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他曾发表了一部《西儒学案》,分别介绍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边沁以及康德等哲学家的生年及其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其意义有如给中国人提供一部西方近代哲学简史。”^[5](第352页)作为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贺麟先生又具体评论道:“《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是1903年发表在《新民丛报》第25、26、28、46—48诸期上的。这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康德生活及

其思想的文章。在文中,他宣称康德哲学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然后砥柱狂澜、使万众知所趋向,这两句话尚还扼要。”^[5](第353页)这说明梁启超在译介西方近代哲学大家思想的系统性和关节点方面,是同时代中国学人的翘楚。

三、梁启超的译介与中国哲学术语、概念的更新

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表现之二,就是在概念、术语或范畴上的更新。哲学范畴的清晰、严密,有助于近代哲学理论的形成。

在近代,由于日本自上而下地大力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所以大批的“和制汉词”哲学范畴已在明治年代形成。如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1829—1897),作为日本最早派往西方的留学生赴荷兰莱登大学学习三年(1862—1865),他在1870年的私塾“育英舍”中的讲稿《百学连环》中用汉字创译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范畴。如,他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此词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1874年的《百一新论》论中)^[6](第145页),将“Spirit”译为“精神”^[6](第151页),提出了“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归纳”、“演绎”等数量很多的哲学用语。西周因曾任“开成所”(东京大学前身之一)教授、东京学士会会长、文部省顾问,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颇高,他在后来公开发表的论著中陆续使用以上哲学用语,故使其推广到当时的整个日本学术界。1881年,日本人的首位哲学专业教授、留学德国六年的井上哲次郎博士组织编写了《哲学学汇(字典)》,搜集、整理了已普遍运用的和译汉词哲学术语,使西周等人创译的“哲学”类术语在学术界、思想界乃至社会上广为流传。这些为20世纪初的梁启超译介西学和宣传哲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如:在梁启超1902年写作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中,“哲学”、“宗教”、“诡辩”、“空想”、“观察”、“实验”、“经验”、“理论”、“意识”、“智慧”、“精神”、“思想”、“假相”、“真理”、“谬误”、“定律”、“原理”、“定理”、“政治”、“自由”等近代的哲学术语或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新术语被大量使用。在他1903年撰写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也反复地出现了“直觉主义”、“快乐主义”、“感觉”、“知觉”、“推理”、“观念”、“空间”、“时间”、“现象”、“本质”等等哲学术语。而在他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1902年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科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等现在仍在当代中国哲学界运用的术语。让人感到惊叹的是,梁启超还在此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简要观点,“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今译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少数之强者所压伏。”^[3](第86页)这大概是中国人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观点的思想资料之一。

当然,西周创译的“哲学”等汉字哲学术语并非全是梁启超首次介绍到中国国内来。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术志(1895年刊)中就谈到当时的东京大学“分法学、理学、文学之学部……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7](第798页)。然而,黄遵宪只是从介绍日本的大学学科设置的情况中提到,并未从学理上阐述什么是“哲学”。

笔者试图在此说明,由于梁启超所选西方哲人之精,所撰译介西方思想文章之多,所发表此类“学案”时间之紧凑,是当时其他中国学者不可比拟的。加之,梁氏译介西学,“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刊登梁启超所撰之文的《新民丛报》,“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数十;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8](第62页)。这种“影响”当然包括对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胡适回忆当年时说:“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梁启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士、笛卡尔、宾坦(Bentham)、康德、达尔文等诸泰西思想家。”^[9](第89页)

这里,也不妨与同时代的介绍西洋思想最早的严复略作比较。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英人赫胥黎原著)于1898年正式出版后,适逢中华民族危机加剧之时,从一个侧面回应了社会民主救亡心理的需要。随后,严复又直接从西文版本中翻译出版了《原富》(亚当·斯密原著,1901—1902年出版)、《群学肄言》(斯宾塞原著,1903年出版)、《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原著,1903年出版)、《社会通论》(甄克思原

著、1904年出版)、《法意》(孟德斯鸠原著、1904—1909年出版)、《穆勒名学》(1905年出版)、《名学浅说》(耶方斯原著、1909年出版),即“严译名著八部”,数量不少,质量较高,选材精当,均多为西学名著。但是严复将其译作的阅读对象定位于“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见其与梁启超的通信),翻译过于“求其尔雅”,其创译的哲学术语大部分未能流行开来。如:他在《穆勒名学》中,将 Intuition(今译为直觉),译为“元知”;将 Consciousness(今译为意识)译为“觉性”;将 Induction(今译为归纳)译为“内籀”;Deduction(今译为演绎),译为“外籀”;将 Reason(今译为理性),译为“良知”;将 Space(今译为空间)译为“宇”、将 Time(今译为时间)译为“宙”^②。

20世纪初之后的中国哲学术语的大致统一,西方哲学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中国近代哲学思想更具思辨性,不能不说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居日学人借用“和制汉词”新语的译介工作有着重要的关系。

四、梁启超的译介与中国近代哲学的构筑

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表现之三,是在理论内容上较之古代哲学有了很大的深化和突破。梁启超借助日译西学在此问题上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里仅以理想人格论为例。

中国古代哲学中尤其是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学说,主要体现在君子论上。君子是具有儒家的理想人格的人。孔子认为,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包括正己和正人两个方面。正己是从事自我的道德修养,正人是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大学》中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做一个君子,首先应该搞好自身的道德修养,然后推己及人,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儒家把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完全寄托在君子的人格上,只有培养出这种全面发展的君子人格,儒家才有可能推行德政于天下。这套学说是中国历代的理想人格论的基础,并影响到从龚自珍到康有为的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家。

梁启超吸收了日译西学和日本明治思想家的成果,经过改造和融会,提出了中国近代的理想人格论——“新民说”。

何谓“新民”?梁启超指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10](第3页)“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10](第5页)他提出,既要继承和改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要吸取外来文化中的新精神,在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下,他更强调后者,“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风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10](第6页)。“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10](第40页)看来,梁启超认为新时代的国民最需要培养和造就的是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他还指出:“日本大教育家福泽谕吉之训学者也,标提‘独立自主’一语,以为德育最大纲领。夫自尊何以谓之德?自也者国民之一分子也,自尊所以尊国民故;自也者人道之一阿屯也,自尊所以尊人道故。”^[10](第68页)“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自立焉者也。”^[10](第69页)并着重提出了以下观点:“凡自尊者必自爱”^[10](第71页);“凡自尊者必自治”;“凡自尊者必自立”^[10](第72页);“凡自尊者必自任”^[10](第74页)。显然,这是吸取了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传播西学的大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思想之核心,即“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11](第14页)。梁启超甚至提出作为近代的国民应具有公德的思想,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有一物焉置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10](第12页)“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适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10](第14页)“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10](第15页)总之,作为“新民”应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利群的公德。梁启超提出了中国近代的新型

的理想人格论,突破了以君子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理想人格论的藩篱,也为鲁迅等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提供了重要启迪。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而其所依据的重要思想资料就是日译西学。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过程中,这并非个别现象。如章太炎 1910 年在日本撰写的《齐物论释》中阐发的自由观与平等观,除吸取了佛学思想之外,又与日译的康德、叔本华之书密切相关;李大钊 1919 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重要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部分内容就是对日本近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文观点的吸取和综合;李达在留学日本期间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日译西学尤其是日文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重要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环节,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以便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过程。

注 释:

- ① “日译西学”:此处主要指日本近代学者所翻译、编译、介绍西方学术和思想的论著。
- 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论述并非是对近代翻译词语的优劣判断,而是对于历史上译语使用情况的客观描述。

[参 考 文 献]

-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7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4] 《梁启超选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年版。
- [5]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浙记》,载《中国哲学》第 2 辑,北京: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 [6] [日]大久保利谦:《西周全集》第 4 卷,东京:宗高书房 1981 年版。
- [7]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8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9] 《胡适自传》,合肥:黄山书社 1986 年版。
-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6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11] [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 [12] [日]丸山真男:《近代日本综合年表》,东京:岩波书店 1968 年版。

(责任编辑 桂 莉)